

## 论左宗棠的海防思想

彭绍国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作为晚清名臣, 左宗棠除力主塞防外, 还特别关心海防。身为洋务运动的地方代表之一, 他直接继承林、魏“师夷一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并且培养了一批海防人才, 坚持海塞防并重, 主张重视海军的指挥权和加强海口的重点防御, 加强台湾的防务等海防思想及措施, 同时, 将“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海防思想对晚清海防、海军建设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左宗棠; 海防思想; 塞防

**中图分类号:** K253.9      **文献标识码:** A

### 导论

作为晚清名臣的左宗棠, 除力主塞防外, 还特别关心海防。身为洋务运动的地方代表之一, 他直接继承林、魏“师夷一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创办了福州船政局, 并且培养了一批海防人才, 坚持海塞防并重, 主张重视海军的指挥权和加强海口的重点防御, 加强台湾的防务等海防思想及措施, 同时, 将“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海防思想对晚清海防、海军建设产生了影响。

关于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 关于左宗棠与太平军的关系, 以及关于“借洋助剿”问题等取得了许多成果。主要著作有刘泱泱《左宗棠研究文选》其中收纳了刘泱泱《左宗棠的历史定位》, 主要运用历史唯物史观对左宗棠进行了定位作者认为左宗棠是杰出的爱国者、政治家、军事家。<sup>[1]</sup>李扬帆《走出晚清 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本书从晚清风云变幻中的著名人物谈起, 梳理了晚清时期的对外关系, 并由此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外关系进行论述, 对中国当代的外交观念进行审视, 希望中国能真正“走出晚清, 走向全世界”。<sup>[2]</sup>皮明勇著《左宗棠》, 他认为左宗棠是清代后期重要军事将领之一, 曾先后参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在维护国家边防、收复新疆等重大军事行动中, 曾立有军功。此书叙述和评介了左宗棠曲折复杂的一生。<sup>[3]</sup>主要论文有施渡桥《论左宗棠军事思想》主要论述左宗棠从 1852 年(咸丰二年)在湖南巡抚幕府佐理军务, 到 1885 年(光绪十一年)病逝于福州抗法前线, 30 多年中, 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他在建军、治军和战争指导思想方面都有许多特色。<sup>[4]</sup>当然, 也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左宗棠军事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具有颇多成果。主要有王聪延论述了鸦片战争爆发后, 西北边城伊犁被俄国窃据, 东南宝岛台湾被日本侵占, 面对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防危机, 清朝政府引发了以李鸿章与左宗棠为代表的近代“海防”与“海防塞防”并重之争, 这场大辩论对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sup>[5]</sup>林爱枝谈到在国难当头之日, 左宗棠主张通过洋务运动加强海防并积极进行塞防来巩固领土的主权。<sup>[6]</sup>王聪延在《略论近代“海防”与“塞防海防”并重思想——以左宗棠、李鸿章为个案》中谈到鸦片战争爆发后, 西北边城伊犁被俄国窃据, 东南宝岛台湾被日本侵占, 面对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防危机, 清朝政府引发了以李鸿章与左宗棠为代表的近代“海防”与“海防塞防”并重之争, 这场大辩论对近代中国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等等。<sup>[7]</sup>

关于左宗棠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以往的学者多关注研究左宗棠的塞防，虽有学者对其海防思想进行过讨论，但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必要必要推进。

## 一、左宗棠海防思想形成的背景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中国基本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传统的“重陆轻海”的观点根深蒂固，未受到挑战。因此，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没有一种海洋的主权意识，更没有近代的海防思想。

### (一) 时局危急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古代的天然屏障反而成了列强最主要的突破口，一望无际的大海却成为软肋，中国海防危机日趋深重。面对这样的挑战，国人开始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因此，这种海防思想伴随着这种“海防危机”的时代背景应运而生。而左宗棠的海防思想的形成正是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冲击后，中国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回应。显然西方文化的这种“挑战”刺激了左宗棠海防思想的形成。这种“挑战”的回应也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中，中国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sup>[8]p82</sup>。一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定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社会是变革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而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正处于这种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左宗棠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和中法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他的一生同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有密切的联系。他既参加了镇压太平军、西北回民军和捻军的反清斗争，同时也曾全力投入收复新疆的斗争，并以垂暮之年驰骋在抗法战争的前线。因此，左宗棠经历了这个时期各种剧变其海防思想的形成及演变也不得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列强凭借海上优势对于中国的渗透一步步加深，中国的海洋危机也随之加深。面对这种危机，英勇的中国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左宗棠海防思想就是其所处时代影响的产物。

### (二) 前贤影响

左宗棠自小饱读儒家经典。显然，读四书五经肯定读不出海防思想，所以只能是左宗棠读了海防方面的著作或者参与过海防。从《左宗棠年谱》及传记来看，左宗棠海防思想主要受林则徐和魏源的影响，但左宗棠并未见过魏源，而和林则徐也只是湘江上的一面之缘。所以左宗棠直接从林、魏处获取著作的可能性不大。左宗棠可能主要通过三个人读到林、魏的著作，这三人分别贺熙龄、陶澍和胡林翼，他们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并与左宗棠有着复杂的关系。

贺熙龄和左宗棠是师生加亲家关系。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贺长龄曾任编修、学政、巡抚、总督等职，与魏源是好友，曾请魏源以自己的名义编辑成《皇朝经世文编》。所以贺家藏有魏的著作可能性很大。而根据《左宗棠全集奏稿》记载，贺长龄母亲去世时回到长沙，

左宗棠对贺慕名前往拜访。贺长龄十分感动,便把家中所藏的图书悉数借其阅读,每次借阅时“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无稍倦厌。”<sup>[9]p28</sup>由此推论,这时左很有可能读到魏源著作。左宗棠与陶澍是亲家关系,并且陶澍儿子既是左宗棠学生,又是左的女婿。陶澍曾任两江总督,林则徐、魏源、胡林翼都是他的学生,林则徐也曾在他手下做事。所以陶澍家藏有林、魏著作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所以,在这期间,左宗棠读到林、魏著作的可能性也很大。左宗棠与胡林翼则是同学加老乡关系,二者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胡林翼多次在林面前举荐左。胡林翼在贵州黎平任知府时是在林则徐手下做官,因此,胡林翼家藏有林的著作的可能性也很大。通过同学加老乡这层紧密关系,左也很有可能读到林的著作。

因此,这三人实际上起到了媒介作用。而林、魏对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林则徐是较早关注海防的。他的“凭谁议海防”的呼吁也影响着左宗棠,左并曾赞其为议海防第一人。左宗棠在《林文忠公政书》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林则徐的海防贡献,他提到,近代以来,“谈海防者必推公”<sup>[10]p35</sup>肯定了林则徐在海防方面的建树。从而林则徐对海防的探讨也影响了左宗棠。其次,魏源对左宗棠的影响也较大,特别是其著作《海国图志》。在道光末年,左宗棠读到了《海国图志》。他称赞《海国图志》对于英国的介绍“大概情形言之了了”<sup>[11]p23</sup>。鸦片战争后,魏源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无疑左宗棠是魏源“海防”思想的受益者。左宗棠在设立福州船政局的时候就说“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sup>[12]p45</sup>这也说明了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与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师承关系。总之,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一方面是对西方海洋文化挑战的回应,另一方面师承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具一体的海防思想。

## 二、左宗棠海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一) 左宗棠早期海防思想

由于中国古代重陆轻海的观点,导致中央王朝对海洋的了解的极度缺乏。在左宗棠看来,自唐、宋到晚清,每当遇到“海事”,当朝统治者对于“海事”的处理往往是敷衍了事,不加以重视。官修、私修史书(史传、载记)有关海洋事务的记载也不多,往往是“粗悉梗概”<sup>[13]p6</sup>。这是导致中国对轻视海防最重要的原因,以至于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的海上进攻猝不及防。而左宗棠关注海防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当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左宗棠就开始关注英国这个海上国家以及了解海防事务。左宗棠一方面批判英国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一方面又感叹英国的富庶“远甲诸蕃”。他也意识到要抵抗这个海上帝国的侵略必须加强海上防务。因此,鸦片战争期间,当时左宗棠就广州防务提了几点建议:第一,封锁广州入海口,屯兵坚守清野;第二,坚守险要位置以围困来犯英军;第三,补充兵员,招募当地水勇,发动当地群众共同抵抗英军。同时,左宗棠建议在当地兴练鱼屯,增设碉堡;训练水勇及渔民,利用小艇的灵活性偷袭英国军舰;更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左宗棠已经看到了英军的“坚船利炮”,因此他草拟了一份海防提案,建议清政府淘汰旧的船炮,开设兵工厂改造新式炮船。在给他恩师贺长龄的书信中,左宗棠也曾表达了他对于海防的建议。在书信中,左宗棠提到

海防必须得从长远考虑做好防守准备，还提出海防的关键在于：“注重练兵、造炮船火船”<sup>[14]p239</sup>。

后来随着仕途的风顺，左宗棠的海防思想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1852年是一节点，当时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出山辅佐湖南巡抚张亮基，提出“造船以争大江之险”<sup>[15]p79</sup>的防御主张。此时的左宗棠特别关注轮船在海防中的重要作用，他也曾反复论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随着他对海防的进一步了解，他于1863年再一次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建议。其具体主张是从军费拿出一部分，仿造西方战船，以图“海疆长久之计”<sup>[16]p102</sup>。后来左宗棠又提出仿制西方先进的枪炮来加强海防。他主张先从西方购买轮船，并且雇佣洋人驾驶，然后中国人再学习其法，虽然开始花费较大，而“终必享其利”，虽有困难，而“终必有所获”<sup>[17]p33</sup>。左宗棠认为中国人的智慧高于西方人，若是用心学习，仿制西方利器，自然就会越来越精于西方，就好比历学、造钟表都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后逐渐进步的。若是照此法，十余年之后，中国必定能与西方列强抗衡。接着，左宗棠将制船造炮付诸于实践，设立福州船政局。除了仿造轮船，左宗棠还仿造西方的小轮船，并在两湖适航。当时应邀出席的德克碑称赞其与西洋所造几乎无差别，并打算代为制造，“以西法传之中土”<sup>[18]p64</sup>。但此时左宗棠的海防思想并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仅仅停留在“造船与训练水兵层面”<sup>[19]</sup>。

随着左宗棠的南征北战，其海防思想不断发展完善。虽然左宗棠是塞防派的代表，且常年征战于塞外，但他并没有忽略海防的重要性，时刻关注着海防。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塞防之争时，他的海防思想已经逐渐形成。在清末的两次海塞防之争中，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以海防为重，被后人称为“卖国的奴才”<sup>[20]p387</sup>，而左宗棠主张海防、塞防并重。两者都意识到加强海防是当前要务。左宗棠的海防思想在两次论战中不断成熟。在论战中，左宗棠不仅仅只关注西方的炮舰，还开始从全局出发来加强海防。实际上一个系统完善的海防思想应该包括海军建设和海防作战两个方面。而此时左宗棠逐渐涵盖这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海军建设方面，左宗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论战中也极力主张建立新式海军代替传统水师，并且对海军区域划分，海军的指挥系统、海军的装备、兵员的训练都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其次是海军作战方面，左宗棠也有关注，如他主张以守为战，专防海口等等。因此，左宗棠的海防思想起因于鸦片战争，在其征战仕途中逐渐发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形成，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逐渐完善成熟。

## （二）左宗棠海防思想的发展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创巨痛深”以及对日侵台的屈辱求和，这使得晚清朝野都认识到必须加强海防。1874年（同治十三年），当中日签订《台事专条》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如何加强海防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以造船、练兵、筒器等六条作为海防最紧要的事宜。同时，总理衙门上书清廷，建议就海防等事务由沿海各省督抚论，最后由在朝廷详细讨论，这就是清廷的首次海防大讨论。收到关于海防大讨论的来函之后，左宗棠提出了关于如何加强海防的六条建议。其建议精密无隙，“宜规久远”<sup>[21]p64</sup>。这表明左宗棠对加强海防的重视。在海防大讨论中，除极少数顽固派反对建设和加强海防外，大多数朝臣都支持加强海防，以御外辱。此时的左宗棠还在剿灭太平军，事毕之后他将精力放在海防上。他的海防思想也是在

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并付诸实践。

### 1、重视现代轮船的作用

在古代，由于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其防御中心也主要集中在北方陆地，由此形成了一种“重陆轻海”的观点（重塞防轻海防）。但随着满清在鸦片战争中的大败，左宗棠意识到东南沿海的重要性，英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海上，而不是陆地。左宗棠看到，中国由北到南，自北方的辽东半岛，经山东，上海、福建等省，至南方的广东，大海实际上是“环其三面”<sup>[22]p60</sup>。而自从中国同西方列强的海战以来，其倚仗着其坚固的轮船在中国沿海横行。列强轮船的优势体现得非常明显，其轮船“星驰飘举，无足当之”<sup>[23]</sup>。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提出在中国设立轮船制造局制造现代轮船。他认为中国要防御列强的海上威胁，必须建立一只近代水师，但近代水师必须配备现代轮船，因此，“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sup>[24]p63</sup>因此，左宗棠在担任浙江巡抚时候，就曾写信给总理衙门，建议总理衙门拿出多余经费仿制外国先进的轮船，以此作为巩固海疆防御的长久之计。他于1865年再次提出仿制轮船的建议；左宗棠认为轮船是近代海战的不可或缺的“利器”，英国等欧洲列强以此来欺压中国。后来，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左宗棠再一次提到欧洲各国同中国相比，其在海上的优势地位体现在其坚不可摧的轮船。假设以后中国同欧洲各国发生战争，左宗棠认为在陆上，中国与欧

洲各国则各有所长，其优势地位并不明显，甚至中国“有其过之”<sup>[25]p68</sup>；但是在海上，欧洲各国的优势地位就体现出来，那就是他们有坚固的轮船，而中国没有。因此，左宗棠提出中国必须仿制列强的轮船，以“防洋缉盗之用”<sup>[26]p69</sup>，同时还得学习轮船的驾驭技术。这样的话，十余年后，中国也有现代的轮船与欧洲列强相抗衡。

后来，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的时候又向总理衙门提出仿制外国轮船的建议。他提出中国要加强海防，除了需要清明的政治、加强士兵的训练之外，还要制造轮船，以此达到“夺彼族之所恃”<sup>[27]p25</sup>的效果，因此，必须招揽轮船方面的人才，为轮船制造下拨专门的经费，同时，他建议加紧筹备制造轮船的费用，赶在中国同英法换约之前完成仿制欧洲轮船，以改变在同英法换约时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左宗棠建议晚清政府改“购雇”为“制造”，因为欧洲各国的轮船横行于海上在于其先进的造船技术，中国必须“师其长以制之”，自己“制造”轮船，以此来与之抗衡。左宗棠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横行于海上主要倚仗坚固的轮船，各国以此“互相矜耀”，竞相鲸吞、乘虚蚕食中国的领土。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要自强，必须学习欧洲各国，“师远人之长”<sup>[28]p67</sup>，那么，远人所长之处显然在于其造船技术，因而左宗棠主张设厂造船。

左宗棠特别强调设厂造船的自主权。他认为中国谋求自强的道路，必须自力更生，不可求之于列强，如果完全依赖外国，就会受制于他国，因此，求人不如求己，“求己者操之己”。所以，他认为中国想要独立制造轮船必须先学习其制造轮机的方法，也即造船的技术，这种技术将成为中国“永远之利”。但左宗棠认为学习西方的造船技术并非仅仅是为了造出轮船，而是使轮船为我所用，那么还必须学习轮船的驾驶技术；并且并非只求一两个人能够制造、驾驶轮船，而是促进制造、驾驭轮船技术在中国不断的进步、发展以及得到广泛传播，达到

“传习无穷耳”<sup>[29]p27</sup>的目标。由此可见，他在设厂造船中强调独立制造，强调“西法”为我所用。平定太平军残余势力之后，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正值晚清政府讨论是否从国外购买轮船。但左宗棠持反对态度，而坚持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轮船，显然，他在当时能有此远见实在是难能可贵。左宗棠认为，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向外国“借”轮船，不如向列强“雇”轮船，“雇”轮船又不如从外国“购买”，“购买”不如中国自己“制造”，因此，在租借、雇佣、购买、自造四者之间，显然左宗棠认为“制造”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他主张轮船“以自制为便”<sup>[30]p46</sup>。

## 2、兵船“两用”

兵船，又叫战船，他们最主要的作用是为防御或在战时作战，是船的类型之一，在我国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而船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早期船只独木舟诞生。此后人们为了生活就用木头建造更大的船舶。进入阶级社会后，人们为了阶级利益相互斗争，从陆地到江河湖泊海洋，战船就于此产生。以后，战船一路繁荣发展，享誉世界。直到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飞速发展，西方各国为加紧进入帝国主义行列而努力掠夺拓展殖民地，因而远洋航行的钢制轮船取代了木质帆船。而此时的清王朝统治江河日下，封建统治正走向衰竭，闭关锁国再加上腐朽的制度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造船业走向停滞，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落后就要挨打，该如何自强，如何在巩固国防的同时，也能提高生产力，就这一点，左宗棠做了以下建议。

左宗棠认为自造的轮船不仅能够为兵船所用还能为商船所用，这样既能巩固海防，同时还能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所以，他建议所造轮船的船型要兵商兼顾，用新造的轮船来运粮，新造轮船同时还会获得和雇沙船运粮所花费的价钱一样的薪酬，轮船的漕务安排一切都听从商雇，这样可以实现其价值，同时还可以为修造筹集费用。和平时期为商业所用，当海疆遭到贼人侵扰时，轮船则专门听从调遣为巩固海防所用，到贼人的侵扰的地方，“分攻合剿”随时能成。后面再有轮船造成的话，就可以用来装载商货，同时可以捕捉海盗为商货运载保驾护航，这样习劳与集费可兼得，如此，一年下来管理整修的经费也不需要从别处筹集。他还由此而推论出：轮船成功得到发展，漕政同样就能得到兴盛，那么军政也能振兴，商民的困难就会得到解决，海关的税收也就会随之增加，“一时之费，累世之利也。”以上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人们逐步认识和接受轮船这个新事物是有着积极影响的。而“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sup>[31]</sup>这表明用轮船来取代沙船的近代化！向是不可逆转的。

## 3、主张以新式海军代替传统水师

对水师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但中国的传统的水师与近代意义上的海军有本质区别的，两者不仅在装备、战术等方面存在差异，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中国传统的水师活动主要还是内河、湖泊，而近代海军的活动主要在海。随着人们对海洋的开发，新式海军在近代海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左宗棠主张建立一只新式海军，也就是完成由传统的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型。因此，左宗棠认为中国的海防对海岸沿

线的防御“非整理水师不可”。他这里所谓的“水师”实际上是指具有近代化意义的海军。因此，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福建海军的建立与左宗棠重视新式海军的远见息息相关。建立新式海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关于海军区划的问题。

对于海军的区域划分这个问题，左宗棠和李鸿章、丁日昌的分歧比较大。李鸿章主张海军“划疆而治、分洋设防”。但左宗棠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由于新式海军的机动性比较大，若是分洋设防会导致各洋海军的割裂。因此，当丁日昌提出由北至南分别建立北洋、福建、南洋三洋水师的时候，左宗棠持反对意见。左宗棠认为海防应该一体，其优势在于：若是遇到战事，其他区域的轮船可闻警支援；但是如果将海军区域划为三洋，各司其责，各守其区域，这会导致贻误战机，也会割裂各海军。并且，分别在北洋、福建、南洋三洋设立三个提督，彼此互不统属，势均力敌，彼此之间的意见很难达到统一。况且，其他的七省督抚虽然可过问海防但却不能使三个提督意见相同，那么督抚也犹如形同虚设，从而导致各提督之间议论纷纭，“难言实效”<sup>[32]p456</sup>。左宗棠在第二次海防大讨论中将自己的海洋区域划分的主张阐述的更加详细。他主张总共设立十支舰队，但十只舰队不分洋设防，而是统一领导，并且每只舰队配备快船、鱼雷、铁甲、炮船，每只舰队设立一名统领，一名帮统，其中八只舰队分别驻守在各省的海口，其余二两只舰队，“一巡东洋，一巡西洋，每年轮换”<sup>[33]p62</sup>。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将十只舰队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调配，防止因为海洋区域划分导致的互相割裂、指挥不灵、延误战机的弊端。

而关于是否在新式海军装备铁甲舰这个问题上，左宗棠的主张在两次海防大讨论中是不一致的。由于左宗棠对于铁甲舰的认识不够，因此，在第一次海防讨论中，他对于是否在新式海军装备铁甲舰的立场还不是很坚定，而是建议先购买铁甲舰，等购得之后再看其是否合适装备于新式海军。左宗棠之所以有此主张，主要由于他对于铁甲舰的顾虑。因为，在他看来，虽然铁甲舰的优势很明显，能够冲劈敌方的轮船，然而当铁甲舰靠近的时候也会引起巨浪，这会影响轮船的从容起碇，并且铁甲舰“质重而坚，不能入口收泊”<sup>[34]p109</sup>。左宗棠认为西方各国海军配备铁甲舰是由于他们在海上建有水炮台，方便轮船的停泊，并且西方各国海军的轮船、铁甲舰停泊在外洋，而中国的轮船仅仅在外洋航行，最终停泊是依附在沿海各山岛，都有一个固定的停泊地点，因而不需要这样的水炮台，如果海军收泊回各口岸，那么，铁甲舰也不能进入停泊口岸，也不怕铁甲舰的冲劈。因此，左宗棠主张等购买到铁甲舰之后，“再为察验，庶可决其合用与否”<sup>[35]p524</sup>。而在第二次海防讨论时，左宗棠的态度发生改变，他不仅赞成从国外购买铁甲舰，而且还建议清廷建立一只海军舰队，这只海军舰队由海上机动兵力和沿海防御兵力共同组成。

作为一个新的军种，海军和传统的陆军有着质的差别，这也要求海军必须从陆军系统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的海洋管理和调度机构。在中法战争中，由于中国海防力量不能及时的统一调配，并且事权不一，导致在海战中处处受掣肘，鉴于此，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1885年7月29日）向清廷上书，在这份名为“请专设海防船政大臣”的摺片中，左宗棠建议清廷设立一个海防全政大臣来统筹海防全局。海防全政大臣负责练兵、选将、制船、造炮、筹响等海防事务，并为海防全政大臣建立独立的衙署，驻扎于长江流域，以此为基地，可以“南控闽、粤，北卫徽辅”<sup>[36]p9731</sup>。左宗棠还建议海防全政大臣除了驻署办事之外，还必须定期的巡阅周边，“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外还设立一个副臣作为海防全政大臣助手，

辅助海防全政大臣处理各项事务,但两者各自权有专属。此外,左宗棠还对海军建设提出了七条措施:第一条就是关于海军轮船的制造,主张“师船宜备造也”;第二条关于海军营制的建设,主张“营制宜参酌也”;第三条关于海军士兵的巡守操练,主张“巡守操练宜定例也”;第四条关于海军各局的架构,主张“各局宜合并也”;第五条关于海军军费的筹备,主张“经费宜通筹也”;第六条关于与海军联系的铁路建设,主张“铁路宜仿造也”,第七条关于海军的练兵问题,主张“士气宜培养也”,也就是他所说的练兵首要练心,其次练胆,再练力量与技巧。并且,左宗棠特别强调士兵在海战中的重要性,认为海战“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

#### 4、提倡台湾设防

台湾作为中国最大的岛屿,由于其地处东北亚与东北南间的交界线上,对于巩固我国东南沿海的防御有着重要作用,其在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近代以来它成为列强争夺的“猎物”。但当时台湾的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未引起晚清政府的重视,并且台湾当时的海防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不对称的。尽管在当时台湾有驻军,但当时偌大的台湾仅仅只有万余名兵将,并且守军的军纪废弛,战斗力非常低,为数不多的所谓的“战船”也是长期无人看管,更别谈训练打战。看到此情形,左宗棠就奏请晚清政府加强台湾的防务。实际上,在此之前左宗棠就注意到台湾在东南海防的战略意义。左宗棠在海防的论战中就较早提出了“必须在台湾设防的思想。”<sup>[37]</sup>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再一次阐述了台湾海防的重要意义。左宗棠认为台湾当时作为中国的“一郡”,也是福建省的“外郭”,两者关系就好比锁与钥匙,台湾是锁,厦门、澎湖则为钥匙。那么,鹿仔港与鹿耳门就是“通钥之窍也”<sup>[38]p48</sup>。

他于1866年再一次上奏朝廷,再次强调台湾的战略意义。在奏折中,左宗棠指出台湾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并且远隔重洋,其战略意义在于“为全省安危所系”<sup>[39]p24</sup>。左宗棠还就如何加强台湾防御事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左宗棠认为要加强防务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整顿吏治,对于出任台湾的地方官严格把关,任用选派的地方官必须克己奉公、严于操守,勤于政事;第二,恢复更戍旧制,为了保证驻军的战斗力,对于驻防台湾的驻军实行三年一轮换,并且整顿水师,裁汰冗兵,减少冗费;第三,发展台湾的地方经济,以解决军队给养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左宗棠主张奖励垦荒、松弛垦荒的政令”,并且广设粮仓、广存余粮,以保证战时所需。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再一次刺激左宗棠加强对台湾控制的决心。当时年过七旬的左宗棠实际上精力交瘁,在身体病重的情况下,他连续两次上书清廷,建议当局加强对台湾的防御,并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意义的建议。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作为东南沿海各省的门户,台湾孤注于太平洋,关系着整个东南沿海的海防,乃至整个中国全局的海防,因此他奏请晚清政府将福建巡抚驻守于台湾,“以资镇摄”<sup>[40]p403</sup>。关于左宗棠所提议的将福建巡抚驻守于台湾,不仅大部分晚清官员是持支持态度的,就连晚清政府是对此也是认可的,并且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于1885(光绪十一年)设立台湾省,其巡抚由福建巡抚改任,并任命刘铭传为巡抚。清廷在台湾设独立行省的同时又设立了海军事务衙门一职,其职责在



于总理全国的海军事务，海军事务衙门的设立不仅对加强台湾海防有促进作用，对于整个中国的海防建设也是起了积极意义的，当然，这些与左宗棠的建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5、主张民众参与保卫海防

在筹划海防的时候，左宗棠则十分注重沿海民众的力量。他认为“民气可用”，发动和组织沿海民众协同军队固守海防。因此，他主张在沿海各地召募水勇，办理渔团，并将其中技艺高强者挑选为练勇，将来拨为兵轮水勇。并利用沿海渔民组成渔团，令沿海各州县官府组织渔团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只主力军。除了督促沿海各州县训练渔团外，左还亲自对沿海渔团进行校阅，并在观后大赞道：“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崇倭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sup>[41]p21</sup>

古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左宗棠谨记古训并以此作为筹划海防的准则，除了利用民气，左也一样注重“保民”，更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来“保民”视为用来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一直以来，以治水行盐作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是在于海防。这样的话治水有成则能够保民，使得江淮以北的民众不再被外国侵略者所驱使，同时还可以保证两江兵源足有盈余，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外国侵略者的气势则会日趋衰颓，而我军官军气势日益壮大。因而左宗棠在两江任职期间非常注重农事，像主持农田水利一事，一定会躬亲相度，还有凡是修堤坝、开沟池，去淤垫这些无不认真部署，这样淮河、运河得到了治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也一并得到了加固。

自古天朝上国推崇“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所以左宗棠在实现了一系列如治水“保民之道”、加上“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之后，以为凭着中国的这些“本富”就可以与外国的“末富”相抗衡。<sup>[42]</sup>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一定的误差，不仅有一定的误差还与他之前肯定西方通过经商可以致富，并“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意识也是相互矛盾的。

## 6、“专防海口，不争大洋”防御战略思想

在海防作战的指导方针，左宗棠奉行的是防御战略。左宗棠主张海军不应该在大洋上与敌人相争而起冲突，只需要专心在海口设防就可以了。他认为相安无事时海军就巡逻洋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平定海盗；若敌人来犯时那么就齐集海口堵截防御。又因为中国兵船很少，所以在海上与敌人交锋胜算不大，与敌舰追逐于大洋，熟胜熟负“实不可知”。因而左宗棠主张海军海上太平之时只需扬威海上，而当处于警戒时就收进海口做好防御准备即可，以守为战拼。<sup>[43]p55</sup>可见，立足于守，视海军为防口守岸的工具是左宗棠海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加上中国海岸线漫长，不可能每处都加以防备，因此，对于兵力的部署也应当有所侧重。在1874年的“海防之议”中，针对中国海岸线的特点及当时清廷的军事装备能力，左宗棠提出就海防分布而言，像闽、吴、粤、齐、燕、越等等还有的就是一些散落各处的孤岛，只要是能让船停靠的地方，都可以逐一加以勘察而预为之防，这样海防就能得到巩固，然后联合七个省市一同筹划，如此七省只为一片海域联防，这样就好比人的身体一样，由气隧，

血海，筋脉，包络，皮肉等等的区分，即有紧要与非紧要的区别，在紧要处就该加以严防，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sup>[44]p63-64</sup>，可见，在防务战略上，左宗棠坚持的是“以守为主，重点设防”的特点，全面与重点相结合，但又突出重点的原则。

## 7、海防、塞防并重

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防危机日趋深重，西北和东南都遭到敌人的入侵。1865年，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英、俄借此也加入了争夺新疆的行列。到1871年，俄国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此后，日本又以1871年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船员的事件为借口，入侵台湾。中国的海疆与边塞同时出现险情，而清王朝的统治腐败不堪，财政匮乏，面对此种困境。新疆要收复，海防也要巩固。怎样来处理海防与塞防之间的关系，国防资源又将怎样才能合理分布，使中国的国防得到巩固。李鸿章一味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坚持海、塞防并重，不能要海防，不要塞防。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放在该用的地方。海防和塞防，都要合理投入，不能厚此薄彼。

由于以往用于塞防所缺的军饷都是沿海各省给补齐，尤以甘肃为甚。如果沿海为了自顾而停止对西北的支援，那么西北的仗该如何打下去，那样西北将陷入险情，就如俗语中所说“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所以海防需仔细统筹合计，从长远考虑。既要海防也要保证塞防，可资源有限，左宗棠坚持海塞防并重，因而他为了给海防减轻负担，自己想办法为部队开辟饷源。那此时的中国除了沿海各省较为富庶，有能力为西北军提供军饷外，再者比较富庶的则是洋人，那向洋人借款可否行的通呢？由此有了后来左宗棠上奏朝廷申请向洋人借款三百万两，以解燃眉之急。他这一举措有“以夷之矛攻夷之盾”的功效。<sup>[45]</sup>

## 三、左宗棠海防思想的影响

海军建设方面，左宗棠重视现代轮船的作用，并看到了在制造轮船时不能完全依赖他国的轮船，而主张自造轮船，这样可以避免在海战爆发后，中国被他国敲诈的不利局面，其主张对于加强海军装备，特别是轮船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的传统的水师向近代海军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开始重视轮船在近代海战、海防中的重要作用，仿制欧洲列强的轮船也成为左宗棠海防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且，左宗棠将设厂造船付诸于实践。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政府批准了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建议，福州船政局的设立也为中国船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池仲祐就曾盛赞左宗棠此举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sup>[46]p481</sup>。除此外，左在海军建设方面主张以新式海军代替传统水师，对于新建的海军左认为务必加强海军统一的指挥权，并有效地提高各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避免出现像以往指挥系统分散的现象。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采纳，由醇亲王奕譞负责建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此后沿海水师都归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节制调配，统一了指挥权，而这一措施大大地提高了海军的作战能力。更难得是，左宗棠兵船“两用”的海防思想，正因为是适应了当时许多商人向近代轮船运输业转化的要求，从而对于打破中国航运业被外国轮船商垄断的局面是有利的。

在海防战略方面，左宗棠提倡台湾设防，海防、塞防并重，主张民众参与保卫海防，强调“专防海口，不争大洋”等对近代海防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地在海塞防的论战中，李鸿章极力主张放弃塞防、加强海防，左宗棠强调二者并重，但从左宗棠的主张来看他对于台湾在海防的重要战略地位的充分认识不亚于力主海防的李鸿章。他关于加强台湾海防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所主张的在台湾独立设省的建议为晚清政府所采纳。晚清政府也开始关注台湾的防御事务，其防务工作也得到相应加强。台湾海防的加强有利于整个中国的海防建设。台湾设立行省对加强台湾省的长远发展也是起着积极作用。民众参与保卫海防这一主张中，他能够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sup>[47]</sup>更可贵的是左宗棠能够意识到为了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创造一个民有所养、民有所食的这样安定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专防海口，不争大洋”的战略思想，从当时来看左的这一建议无不具有远见的意义，晚清海防主要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兵力薄弱，分区设防重点防御则对于国防战略的设置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左的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从“专防海口，不争大洋”后又发展到不仅“以八军分驻各省海口”，还要用二军巡防大洋，使海军突破海口防御，到更广阔的海领域里去与敌人搏击，从而充分发挥海军海上作战的机动性。

### 结语

纵观左宗棠的海防思想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初步形成之始，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洋务官员的思想步伐，在这一批官员中左宗棠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的海防思想对于晚清国防战略的形成乃至发展调整都具有了一定的促进推动作用，他在海防问题上许多积极有益的认识，对清政府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塞防地位，对中国近代国防建设以及海军的建立和发展，对创办海军学堂、培养造就海军人才，对建立和发展造船制炮军事工业等，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受当时时代因素的影响，左宗棠的海防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摆脱不了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去维护落后的封建王朝统治的模式。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西方各国为了完成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纷纷通过海洋对落后国家进行殖民掠夺，也清楚地认识到海军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到那时人民的海权意识淡泊，也未意识到海权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防思想往往是“重陆轻海”，来自于海洋的威胁较少，随着晚清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所以人们对塞防的防御非常注重，此观念也深入人心。“闭关锁国”隔绝了中国与外界的交流使得信息闭塞，对中国的海军建设重视不够，从而海军发展的良机早已失之交臂，最后封建王朝走向了灭亡。这是左宗棠海防思想的局限性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刘泱泱. 左宗棠研究文选[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 [2] 李扬帆. 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 皮明勇. 左宗棠[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
- [4] 施渡桥. 试论左宗棠的军事思想[J]. 南京: 军事历史研究, 1991.
- [5][7] 王聪延. 略论近代“海防”与“塞防海防”并重思想——以左宗棠、李鸿章为个案[C]. 兵团党委党校, 2015.
- [6] 林爱枝. 海防·塞防——左宗棠之领土主权观[J]. 文史纵横, 2011.
- [8]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9] 左宗棠全集·奏稿七[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0] 林文忠公政书叙,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1] 左宗棠. 答顺天府府丞王孝凤, 左文襄公全集, 书牘[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2] [14] 左宗棠. 上贺蔗农先生, 左文襄公全集, 书牘, 卷 14[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3] 左文襄公全集, 奏稿, 卷 18[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5] 罗正钧. 左宗棠年谱[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2.
- [16] 左宗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全集, 书信[A].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7] 史氏家藏宗棠手札[G].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 [18] [23] 左宗棠全集·奏稿[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9] 黄顺力. 重议海塞防之争[C]. 山西大学, 1988.
- [20] 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21] [24] [44] 左宗棠. 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左宗棠全集·奏稿[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22] [25] [26] 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 左宗棠全集·奏稿[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27] [28] 左宗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宗棠全集·奏稿[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29] 洋务运动(五).
- [30] 左文襄公全集, 卷 8[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31] 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楨折[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32] 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左文襄公全集, 书牘[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33] 张侠, 杨志本. 清末海军史料[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2.
- [34] 洋务运动(一).
- [35] 洋务运动(二).
- [36]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 第二二七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37] [41] 左宗棠. 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 左文襄公全集, 奏稿[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38] 左文襄公全集, 奏稿, 卷五[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39] 左文襄公全集, 奏稿, 卷十九[G].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40] 罗正钧. 左宗棠年谱[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2.
- [42] 左宗棠. 与周苻农阁学, 左文襄公全集·书牘[A].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4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G].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 [45]张立真.评左宗棠的塞防之论与实践[C].辽宁大学,1985.
- [46]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8册[G].
- [47]卢宁.《申报》与晚清海防塞防之争[N].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6).

## On the Thought of Coastal Defense of Zuo Zongtang

Peng Shaoguo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410082)

**Abstract:** Zuo Zongtang, a distinguished official in late Qing dynasty, not only concentrated on frontier defense, but als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coastal defense. As one of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Zuo Zongtang carried forward directly Lin Zexu and Wei Yuan's thought called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he West in order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which means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the west in order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According to the thought, Zuo Zongtang founded Fuzhou dockyard, trained a number of talented persons to protect and construct coastal areas, laid equal stress on coastal and frontier defense. In addition, he held an idea that focus on the special defense of seaport, The command right of navy and the duty of protecting Taiwan. Meanwhile, he put the mission of 'bao min(means protecting people)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 in strengthening the defense of coastal. All in all, for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vy in late Qing dynasty, Zuo Zongta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aspects..

**Keywords:** Zuo Zongtang; Thought of Coast Defense; thought on frontier defence